

收稿日期:2024-05-20

古典乡村骑士遭遇现代都市奇观

——以莫言《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讨论为中心

张志忠

(山东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237)

摘要:对莫言《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进行深度剖析,解读作品在“愚人节新闻”前提下所描述的古典乡村骑士行进于现代都市引发的奇观。借助吉登斯现代性理论、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和钱理群对堂吉诃德精神的阐释等,揭示了作品中所蕴含的乡村与都市的断裂、“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本土的“乡下人进城”文学思潮与世界的堂吉诃德精神传承等,凸显了莫言笔下农民形象所特有的侠气、匪气、霸气等气质。

关键词:莫言;《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乡村骑士;都市奇观;堂吉诃德精神;侠气和匪气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5-0095-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乡村叙事的本土化理论建构研究”(22AZW004)。

作者简介:张志忠(1953—),男,山西文水人,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5.066

莫言小说主打的空间是高密东北乡的乡土世界。虽然他在北京生活的时间长度远远超过他在山东高密乡间生活的时间长度,但是他对北京的书写一向吝啬笔墨,即便是偶有涉及,如短篇小说《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①,似乎都必须借助于来自乡村的两位男女骑士,借助他们的行踪和眼光,才能够对北京产生一定的印象与认知。而具有古典气质的乡村骑士的到来,也给现代豪华都市激起一片怪异的波澜,造成前所未有的幻象奇观。

一、四月一日的时空断裂

万事开头难,小说的开头更难,因为它是无中生有的起点,是为全篇作品定调子的。希利斯·米勒说,开头是不可能的,因为“开头既需要作为叙事的一部分身处故事之内,又需要作为先于故事存在的生成基础而身处故事之外”^[1]。《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的第一句话是:“四月一日下午,侯七从西单地铁站钻出来,一抬头就看到了太阳。”乍看上去,这是一种笨拙的写法,起笔

① 莫言:《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载《钟山》1998年第5期。以下出自该小说的引文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就交代人物、时间和地点,侯七所见平平无奇,看到每天都要升起和落下的太阳。但四月一日却发出明确的提示,作品通篇所叙述的故事就是一则“愚人节的新闻”,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想象与现实之间,看似确切实则混淆的时间指认之间,产生了一种有趣的断裂。这种断裂将会继续延展。

莫言的作品一向善于炫奇弄险,但他在许多时候都是真假莫辨藏奇于实,往往在关节点上出奇制胜,点石成金。如《透明的红萝卜》中小黑孩的铁匠铺生涯高度写实,源自莫言少年时代参加水利治理工程的一段经历,质地绵密,掷地有声,那个晶莹剔透美轮美奂的红萝卜的透明与幻美,由之被烘托而出,神奇空灵。而《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一反常态,文章开头就明目张胆地宣告,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或者臆造,借此为作品的虚幻色彩争取到存在的合法性。

《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这篇小说特征何在呢?用当下的流行语来比方,就是脑洞大开,突发奇想,滑稽怪诞,匪夷所思。在鲁迅的《风波》中,一片农家乐的田园诗意,被赵七爷的到来,以及他强调的燕人张翼德后裔张勋张大帅的赫赫威仪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无情威慑,让悠闲自在地享用晚餐的农家男女都被激荡得乱了方寸,发生彼此间的口角冲突。然而,这样的危机迅速化解,时间未久,过了十多日,张勋复辟的闹剧就宣告平复,乡间的生活秩序又恢复如初,七斤又重新获得七斤嫂和村人对他的尊重了。《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似乎是它的倒影:傍晚时分的北京长安大街上,正是人们下班的高峰时间,车水马龙,一位红裙少妇和她的彪悍护卫,骑着一驴一马,由乡村世界闯入繁闹都市,在长安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自西向东行进,引起众人围观,给本来平静如常的都市人,带来小小的拍案惊奇,激起阵阵波澜。

对这篇小说的阐释,言人人殊,各有怀抱。在笔者看来,这就是莫言笔下凝重的乡村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次瞬间撞击——因为断裂而产生的撞击——迸发出的一束神异火光。

现代性理论研究的大师安东尼·吉登斯说:“毫无疑问,历史发展的很多阶段都存在着断裂。例如,在从部落社会向农业国家过渡的转折点上,就存在断裂的情形。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与现代时期有关的那一种(或那一组)特殊断裂。”^[2]历史的进程中,连续和断裂皆有发生,吉登斯阐述了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独特性所在,即“三个断裂”,首要的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断裂。吉登斯的本意是说,在传统社会,时间和空间具有统一性和同一性,特定时空中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发生于此,都是具体的有内容的存在(就像中国的农历,清明,谷雨,芒种,都是与农业劳动密切相关联的),钟表的发明和使用,统一了全世界的时间,也让时间脱域,抽象化了。无论南极和北极,都使用同一个时间的刻度来标识,其间的各种差异都可以忽略不计,而单位时间内产生的劳动效率成为与时间刻度最为密切的关联物。一个导弹飞行器在规定时间内飞行距离,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就空间而言,断裂体现在地域观念的变迁上。当全球的各个角落都开始与其他地区发生相互联系时,社会巨变的浪潮实际已席卷了地球的整个层面(就像今天,我们走到许多城市,都可以看到碧桂园社区、万达广场等格式化的建筑群,各自的地域特征被湮没)。用这样的断裂理论来考察当代中国的都市与乡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断裂的程度更为可观,但是,正因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都压缩在百余年之间发生,不单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超乎世界各国,传统与现代的粘连掺杂也空前绝后。北上广深等现代繁华都市已经是高度发达状态,让身处其间的人们感受到极大的挤压和无奈、乏味和枯燥,而传统的乡村形态却仍然广袤而顽强地显示它们的存在,以现实的或者是乡愁的方式想象性地存在。换言之,吉登斯的时空断裂、线性历史,在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就变成一种时空折叠的现象,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或者“超现代”都并置在一起,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化社会都叠印在一起。而《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就是由于时间与空间的断裂造成的“含泪的喜剧”。

二、小媳妇骑驴的空间困惑

乡村中的小媳妇骑驴,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是日常生活的一道风景,也是民间文艺表演中的常见曲目。而且,在平常的视域中,乡村的世界非常有限,小媳妇骑驴的目的地指向,常常是回娘家看爹妈。无论在婆家生活状况如何,回娘家看望自己的父母,总是件令人快乐的事情。以“小媳妇回娘家”为检索条目在百度视频进行搜索,既有东北二人转,也有河南坠子,皆为欢乐诙谐的风格,非常喜庆。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院子里,有一尊村女骑驴的雕塑。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殿堂,这里有鲁迅、郭沫若、巴金、丁玲、萧红、冰心、曹禺等文学大师的雕塑。赵树理的塑像与众不同,他走在前面,身后是一位骑在毛驴上的年轻女性。据说这是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的创意。“文学馆院子里还有一座赵树理的雕像,舒馆长当时就提出说,我们不要板正的赵树理,赵树理虽然是文人,但他身上有农民那种很朴实的气息,所以他构思了这样一个场景:赵树理在前面弯着腰,低着头,衣服兜里还插了一支钢笔,后面是一头毛驴,毛驴上面坐着的是《小二黑结婚》的女主人公。”^[3]这样的创意非常别致,但在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原文中,骑驴者并非小芹,而是小芹的母亲“三仙姑”。原文中写道,小二黑和小芹傍晚相会商议怎样反抗包办婚姻,被覬覦小芹美色的金旺兄弟做局陷害,以通奸罪名捆绑起来,送到区上。抗日民主政府的区长眼光犀利,看穿其中的害人阴谋,为小二黑和小芹张目。然后传唤双方的父母到区上去说理断案。“三仙姑”还以为区长要为她撑腰,关于小芹应该嫁给谁的官司一定能够赢,所以她毫不畏惧,兴冲冲地梳洗打扮一番,骑驴出门:

饭还没有吃罢,区上的交通员来传她。她好像很得意,嗓子拉得长长的说:“闺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请区长替咱管教管教!”她吃完了饭,换上新衣服、新手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然后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她骑上,于福给她赶上,往区上去。^{[4]13}

请注意这里对“三仙姑”出行前梳妆打扮的述写。这是赵树理极为俭省的笔墨,用了几个“新”字迅速带过。但它又是不可省略的。在前面,赵树理用很重的笔墨描写过年过40岁的“三仙姑”为了继续吸引村子里的年轻人,竭力做出年轻态,涂脂抹粉得非常可笑:脂粉抹不平岁月带来的皱纹,就像驴粪蛋上下了一层霜。这里就点到为止,不做铺叙。但这里的俭省,又是为了下文的发展做铺垫的。来到区上,先是区长看走了眼,将盛装的“三仙姑”错认为前几天来过的打官司的一位小媳妇,后是围观的人们耻笑“三仙姑”的浑身装扮:

“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儿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4]14}

但是,在为赵树理塑像的时候,将小说中的“三仙姑”替换为小芹,移花接木也是说得通的,而且更符合赵树理的文学精神。它是一种大写意的选择。既然是赵树理在场引路,他理所当然地愿意支持的肯定是乡村里的年轻人,是小二黑和小芹。“三仙姑”的文学形象固然更为鲜活生动,那是因为她身上积淀了几千年的乡村传统文化,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是封闭落后文化的产物。

莫言小说中少妇骑驴也是屡见不鲜的乡村风景。《红高粱》中刚刚嫁给单扁郎的戴凤莲回娘家,就是她父亲牵着一头驴接她回去,路上遭遇埋伏在高粱地里的余占鳌而成就好事的。《食草家族》中的四老妈,被以通奸的罪名驱逐,她骑在驴子上,还主动地把一双鞋子挂在自己脖子上,有些肆无忌惮,而在她的妯娌们看来,她活脱脱一副观音菩萨像,而且散发出奇异莫名的花香。从古至今,女性失贞,被认为是比死亡更为惨重的丑闻,用一双鞋子寓意“破鞋”而挂在女性脖子

上,更是作为对失贞女性的严厉惩罚、绝大羞辱,是本土化的“红字”,从古代沿用至“文革”。四老妈的如此举动,将那双鞋子当作自己的光荣徽章,甚至因为鞋子与乳房的摩擦激荡得春情勃发,显然是莫言固有的叛逆性格之飞扬跋扈的表现。

四老妈跨上驴背后,也许是因为那两只大鞋碰撞她的膝盖,也许是为了减轻毛驴的负担,她弯腰从驴脖子上摘下大鞋,挂在自己的脖颈上,那两只大鞋像两个光荣的徽章趴在她的两只丰满的乳房上。这时,她猛地转了身,对着站在柳树下泪眼婆娑的女人们,挥了挥手,绽开一脸秋菊般的傲然微笑,泪珠挂在她的笑脸上,好像洒在菊花瓣上的清亮的水珠儿。^[5]

然而,将乡野中习见的骑驴少妇的图景搬演到现代都市,一步跨越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的巨大断裂,确实是天方夜谭。

三、长安大道:“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

列斐伏尔把现代城市空间称作是设计的产物,而且是具有“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三重分野。“空间的实践”包括生产与再生产,还包括维系这些生产与再生产的场所和空间条件特点。“空间的表征”可看作特定的专家领域,“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学家、分门别类的政要以及技术专家的空间”,往往包含特定的意识形态,控制着空间的生产、组织和始终。在新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空间常常以空间规划的形式展开,直接影响着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及其功能,并作为一种知识权力产生某种规训作用。如果说“空间的表征”是构念的空间,那么“表征的空间”则是经验的空间,以日常生活为基础,从各种社会和文化力量中生成,与一系列日常化的、感知性的东西联结在一起,很少能够在空间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6]。

在时下对列斐伏尔的翻译中,将“空间的实践”作为一个词组,可能是权宜之计,因为它不符合汉语语法,犯了主语缺失的错误。空间自身是无法进行自主性的实践的,但它也不能够颠倒为“实践的空间”。究其本意,“空间的实践”是指特定空间的生产、形成及其应用。公元1420年,在紫禁城建成的同时,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将元代城墙拆除建成街道,东起东单、西至西单,全长约3.7千米,街名之长安是借取自盛唐时代的都城“长安”,为其含长治久安之意。之后,长安街不断地被拓展延长,成为当今的模样。到《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问世的1998年,长安街已经是一条繁华大道,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宽阔(双向6—10车道)、最热闹、人流最多的街道之一。

那么,什么是“空间的表征”呢?长安街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如同紫禁城伸向东西两翼的两条手臂,而且在具有强烈权力意味的规划设计和工程实施中,它不断地被叠加各种或庄严或繁盛的成分。仅以长安街一角而言。1980年代初期,长安街的西南一侧还留有大量的空地,从1990年代迄今,自西向东有中国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首都时代广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部)、国家电网公司及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国家大剧院等巨型建筑一一崛起,而西北一侧也在拆旧建新的大潮中新建西单图书大厦、中信银行、广发大厦等。美国东北大学于水山教授的《长安街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①,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出发,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国建筑对现代化的理解,以及这种解读在长安街上留下的烙印。作为一条代表国家形象的大街,时代的思想与纷扰都凝固在这条大街上,它是政治的、社会的,也是历史的、艺术的。在学术访谈中,于水山如是言:

要把长安街建设成一条具有象征性的、代表国家的有点橱窗意义的展示空间,是在1949年之后出现的。1949年以后,它的象征意义不断得到提升。历届政府都说要建成长安

^① 于水山,《长安街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街,完成首都的现代化,具体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你会发现对“现代化”的定义每一个时期都会改变——原因是在不断追赶心目中西方那些最先进的东西,把这些隐性价值叫做现代化。每个时期对现代化理解的不同都体现在长安街上的建筑上。^[7]

于水山指出,1950年代长安街两侧的建筑,有电报大楼、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宫、军事博物馆、广播大厦等,是当时的所谓“十大建筑”,是苏联的斯大林式新古典主义,与古希腊罗马艺术、文艺复兴、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十九世纪的折衷主义一脉相承。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毛泽东与尼克松北京握手,到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再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于是就开始建一些建筑专门用来接待外宾,如北京饭店东楼、友谊商店、国际俱乐部、国际饭店、建国饭店等,工业化装配式成为现代化的标志。楼板、墙面等构件在工厂里生产,拿到现场装配拼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华世纪坛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兼顾民族化和地方性,而国家大剧院则是“超现代主义”的,特点是用一种巨型结构,用一个大跨度来建构^[7]。

我们还可以就这“表征”加以重要补充。长安大街上,既是代表政治权力的一个个重要机关所在地,也是每逢重要时日举行盛大群众活动的广场,有西单、王府井、国贸等新旧商业中心。在历史学家眼中,长安街凝聚了古今600余年的漫长历史,是一次次改朝换代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文人也不遑多让,古色古香的天安门和紫禁城,方位的适中和交通的便利,都对他们具有吸引力。1920年代,鲁迅就曾经多次在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内的来今雨轩,闹中取静,会友品茗,他和老朋友齐寿山,在来今雨轩一起合作翻译了荷兰作家望·葛覃的长篇童话诗《小约翰》^①。茅盾、郑振铎、周作人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也是在来今雨轩召开的。

1949年以降,富有全新政治寓意的长安街和天安门,被众多的诗人写入诗行。著名诗人郭小川的《望星空》,就是抒写诗人的时空惆怅与摆脱惆怅而展望长安大街灯火辉煌的。在浩瀚而恒久的星空下,郭小川顿感人生之渺小和短暂:“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呵,星空,/我不免感到惆怅。”^{[8]136}此情非郭小川所独有。苏东坡《前赤壁赋》中的吹箫客,就曾经发出同样的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9]苏东坡则以勿贪勿欲、超乎悲喜的心态,和瞬间永恒的释家境界为其排忧。1950年代的郭小川,以非常别致又非常富有时代性的思想情感路径,将一己之渺小,投放到国家建设、民族强盛的洪流中:“就在我的两侧,/在长安街上,/挂出了长串的灯光;/就在那灯光之下,/在北京的中心,/架起了一座银河般的桥梁。//这是天上人间吗?/不,人间天上!//这是天堂中的大地吗?/不,大地上的天堂。”^{[8]137-138}后人或许会讥笑郭小川的天真烂漫,共产主义的天堂不是一个白天可以建成的,但灯光璀璨的长安大街和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给诗人带来的心灵震撼,却是确凿无疑的。长安街丰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积淀,赋予其独有的“空间的表征”。

《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中的在场者和叙事人侯七,下班的时候从西单地铁站下车上到地面,骑上一辆破烂失修的旧自行车,准备回家,想来他就住在距离西单地铁站不是很远的地方,而西单正是长安街西端的最初地标。骑驴美人和白马骑士自西向东依次走过一系列的街口,西单、六部口、府右街、新华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东单、国贸大厦,而这些地点,就是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的表征”种种。然而,对侯七和那两位乡村骑士而言,他们亲历的长安大街并没有笼罩在上

① 据《鲁迅日记》记载,先生曾82次来到中山公园,60次到来今雨轩翻译写作、品茗就餐、赏花会友。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在1979年曾撰文详细描述了鲁迅先生请他在来今雨轩吃包子、喝茶的故事。先生曾经正经八百地告诉许钦文:“来今雨轩的包子是可以吃的。”引自何永康:《鲁迅先生与冬菜包子》,《四川日报》,2023年2月28日。

述“空间的表征”之下,而是行进在“表征的空间”之中,也就是感性十足、生活气息洋溢的空间,是以丰富驳杂的感性对种种抽象理念构成的“空间的表征”的一种突围和超越。这里并没有大不敬,没有对“表征的空间”的亵渎,恰恰相反,遇到天安门广场的降国旗仪式,乡村骑士“肃然起敬”,场景突变,语气严肃起来:

国旗护卫队的士兵们一个个神色庄严,令人肃然起敬。侯七看到骑驴美人身体挺直,恰似一尊玉雕;马上骑士手举长矛,分明是以古老的姿势,向国旗护卫队致敬。

侯七的视角与侯七眼中乡村骑士对长安大街的观感,让我们发现了被遮蔽在宏大话语下的琐碎却又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侯七因为几年间乘坐地铁上下班,两头不见天日,自喻为穿行于地下的“小耗子”,甚至比耗子还不如。因此,这一天意外地有一截路要骑自行车回家,看到长安大街西边的落日景象,颇有惊艳之感,然后又被骑驴美人和白马骑士的奇观所吸引,竟然痴迷到跟着他们在长安街上从西向东走了很长的路,直到追随其过了国贸桥,看二人绝尘而去。从西单的鸿宾楼,到国贸桥附近街边上叫卖“羊肉串”的吆喝声,都让侯七感到陌生,却又不经意间表现出侯七的生活兴趣所在。两位乡村骑士一路行进中,有急迫地闯红灯前行,也有循规蹈矩地等红灯停步,唯一让骑驴美人动容留步的是她在路边富有欧洲艺术情调的一盆蓝色花朵前停下来,抚摸毛茸茸的花朵,把鼻子凑过去嗅花香,还把花朵掐下来含在嘴上。偌大的街面,路边的景象何止于此,如果不是骑驴美人驻足于此,深情打量,人们又怎么会留意这并不起眼的一盆蓝花呢?

四、侠气与匪气:农民英雄与末日骑士

说到这里,需要追问的是,莫言《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究竟是要写什么,或者说,我们从中读到了什么?

无论是写实还是炫奇,在众多乡土文学作家中,莫言所塑造的人物与众不同。尽管他也随着市场化潮流对乡村的侵蚀而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但他写出了乡村中的“硬汉”,在哀叹的同时仍然不折不挠地表达他对“最能喝酒最能爱,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叛逆者的赞颂,为乡村英雄作最后的素描。《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对毁灭自己家庭的兰老大不依不饶,接连发射41发炮弹,必欲除之而后快,何其决绝。但兰老大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人,他是乡村能人中的能人,能够做出一番大的动静,能够改变一方水土的面貌,有其霸气和侠气。

《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就是这种末路英雄的谢幕。美人和骑士从何处来?虽然说作品没有交代,但他们肯定是从高密东北乡而来,几乎是一步就踏上繁华都市的长安大街,自在从容,稳如泰山,让像个“小耗子”一样或无聊或烦躁地生活在这座世界名城中的侯七“黑暗的心灵深处出现一片耀眼的光芒”,难以摆脱其摄魂夺魄的吸引力。相反地,无论是长安大道上的不息人流,还是沿途的种种景观,都难以让美人和骑士惊讶叹息,他们也不去理会路人发出的“伙计,你们是干什么的”之类关于他们来处的询问。甚至那个绿色的啤酒瓶子从天而降砸在美人头上,他们也不为所动,没有出现应有的伤痛感,更没有因此而愤怒爆发。而恰恰是黑墙上悬挂的那一盆盆花朵,吸引了美人的注意,自然的人热爱同样是自然产物之五彩缤纷的花朵。当美人掐下一朵蓝花叼在嘴里,“显示出一种潇洒之美,好像一个女侠,或者像个女匪”。之所以说她像个女侠,是因为前面曾经简述说,她的红裙上扎着一根羊皮或者牛皮的腰带,绝不是合成革的(爱好是天然?),腰带上佩着一柄镶着钻石的短剑。虽然这短剑一直没有派上用场,但是她的装束正好和她的女侠或者女匪的身份相吻合。

与之相反的是,在作品中白马骑士的装束是用了一些笔墨的,而一旦当蜂拥的人群有可能妨害到骑驴的女子,那位白马骑士的长矛和古剑就毫不留情地舞动起来,宝剑的锋芒,有吹毛断发

之利,居然将一位冒失者的头发削下来,震慑住其他的一拥而上围拢而来的路人。于是,白马骑士的侠气或者匪气得到了证实,也通过互文的方式间接地证实了骑驴美人的类同。

由此,两个颇有游侠之风的乡村骑士,示威性地行进在长安大道上,显示着自身的强悍存在。他们并没有能力对繁华的现代都市构成威胁,但他们的我行我素、泰然自若,确实给嘈杂的城市和卑琐的城市人带来一种强烈的刺激,他们的身影化作一道靓丽的风景。夕阳西下,也许和处于历史转型中的古老乡村的衰败命运有一种互喻,骑驴美人和白马骑士则正在庄严而滑稽地进行他们的告别演出吧。

初读《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最直接的反应是,这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们的一次意外邂逅,而作品似乎也刻意写出全球化时代的某种氛围。骑驴美人的美既非传统也非本土,既古典又现代,既东方又西方,美得不可方物。在一帧帧美女图像的叠加中,读者无法推衍出骑驴美人的眉眼轮廓,但这样的文字却不经意间——借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传递出莫言创作的一大特征,既土气又洋气,既东方又西方,既古典又现代,既中国又世界。广义而言,这样的韵致弥漫在莫言创作的全部作品中,但这样的特征又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法。此处不赘。狭义而言,《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就具有相当的表征。骑驴美人和白马骑士自乡土而来,他们却谙熟大都市的各种行为规则,知道红灯停绿灯行,懂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降旗仪式时表达高度尊重。骑驴美人的一袭红裙,显然不会是百衲裙,也不会是马面裙,而是现代时装连衣裙;他们讲一口侯七们难懂的方言,其艺术趣味又很现代,她停留赏花的地点,一堵又高又厚的黑墙上悬垂下来一排花盆,各色鲜花盛开,“表现出很欧洲的艺术情调”。

说《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很中国,不但是说,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和地点,都发生在中国本土,印记鲜明,还在于它恰逢其时地应和着世纪之交出现的“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创作现象。199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亿万农民被吸纳到城市建设之中,他们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的命运与形象,这些随之成为当代作家纷纷加以表现的主要文学主题,如《谁能让我害羞》(铁凝)、《泥鳅》(尤凤伟)、《上种红菱下种藕》(王安忆)、《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高兴》(贾平凹)、《我叫刘跃进》(刘震云),以及梁鸿的非虚构写作“梁庄系列”等,“乡下人进城”的命名则来自扬州大学徐德明教授。在这一批写实性较强和以大部头为主的作品之侧,《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像一个小品,但它蕴含的意义却不可小觑。“乡下人进城”的作品中,来自乡村的农民,在繁华嘈杂的街道和光鲜亮丽的城里人面前,大多有着难以说清的怨羨心态,或者自惭形秽,或者急欲上位,他们难以跨越城乡之间的巨大断裂。《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更像是一则寓言,表露出乡村骑士对豪华都市的挑战姿态。

从全球化的角度而言,《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中骑在黑驴白马上美女和骑士,就像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变形记和缩写版,一驴一马,一主一仆,在时代的错舛中演出一幕荒诞的喜剧。只不过,在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的时候,世界的现代化刚刚在欧洲拉开帷幕,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言,在这大幕将启的时刻,不但有笛卡尔的理性精神和哲学认知,还有塞万提斯的“暧昧”的混杂性和相对论的不确定性,他的讥讽、嘲弄与含泪的笑^[10]。

按照常规的阐释,堂吉诃德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全球性的现代化刚刚起步的阶段,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力为根基的逐利精神得以确立,堂吉诃德却生错了时代,他所向往的是游侠骑士及其价值观,行侠仗义,除暴安良,路见不平拔刀相救。他以孤身一人之力向“错乱的时代”挑战,可笑亦可悲。在一个普世性的层面上,钱理群教授以自己的一位贵州友人尚沸为例,归纳堂吉诃德精神:

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却又充满了信仰、理想、浪漫精神的,制造乌托邦的时代文化氛围里的一代人,常常具有堂吉诃德气质:执迷于一种幻觉——一个绝对的、

纯粹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尚沸在这方面可算是一个典型。他常常把他理想的对象尽量地美化,我至今不能忘怀,在向我描述他心目中的美的化身时,他是怎样地动情,眼睛闪着光,微笑着,沉迷在一种宗教般的情感中,以至旁观者都不忍心告诉他,那不过是他的一个幻觉。但很快他自己就清醒过来,幻觉破灭了,他又是那样的沮丧、痛苦,这时候谁要去责备他的轻信、轻率,那会是过分的残酷。但不久,他又会制造出一种新的美,又开始新的迷恋,新的破灭,新的痛苦……这就是尚沸:他永远是幻美的俘虏,认真,直率,真诚,甚至到了天真的地步,他是永远长不大的。^[11]

就此而言,莫言和他笔下的乡村英雄,敢爱敢恨,能生能死,可以说是中国乡村中的堂吉诃德,如钱理群所言,信仰、理想、浪漫精神的,制造乌托邦的一代人,常常具有堂吉诃德气质:执迷于一种幻觉——一个绝对的、纯粹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这些大多可以移置在他们身上,只不过他们的本性是农民,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幻觉和真、善、美的境界,都带有乡土气息和农民本色,和知识分子化的堂吉诃德有很大的差异。

侯七和乡村骑士生活的20世纪末期,恰巧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节点。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带来市场化浪潮的兴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了,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领时代风潮,与国际接轨,在城市建设上日新月异。而在1980年代引领改革大潮的乡村经济,却显得相形见绌,两者间的反差显而易见,触目惊心。

从明清时期金碧辉煌的皇城故宫,到像一滴超大无比的露水珠的国家大剧院,长安街被当作中国历史的鲜明记忆,浓缩了600余年的时代印记。公元1420年,大明帝国的紫禁城在北京宣告竣工。是时也,正是西班牙和欧洲的骑士制度走向衰亡之际。再过127年,塞万提斯于1547年出生于西班牙的马德里,1605年《堂吉诃德》上卷问世,风靡一时,1615年《堂吉诃德》下卷出版,而贫困潦倒和耗费精力的写作终于击垮了塞万提斯,1616年4月23日,他因患肝水肿而辞世。但是,当侯七追随着乡村骑士纵贯长安街悠然而行,他顾不上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曾赞叹几年不曾光顾的长安街有什么新的建筑景观,却一直盯紧这两位骑士的一举一动,看这两位当代的堂吉诃德和桑丘在一个傍晚尽情尽兴地进行表演。对侯七和那些围观者追随者来说,他们来自别一世界,因为作品全篇都是从侯七的视角进行叙述,他们一言不发,不与围观者对话,所以彼此之间有巨大的隔膜。有的观看者就曾经发问,他们是马戏团的吗?但是,比起面对整个世界可以无限度地自我选择任意漫游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昆德拉语)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感性历险,他们在长安大街上的匆匆一行,除了表演,还能够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呢?

莫言没有忘记当代中国乡村中的堂吉诃德。在《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问世10年后,像塞万提斯一样,在《蛙》的一个片段中,他给出了这部作品的下卷。无论如何,来自中国乡村的堂吉诃德,还是要回到家乡,才能有更为充分的演示空间。《蛙》的叙事人“我”,还乡养老的退休军官万小足,在家乡发现了一个叫作堂吉诃德的小餐馆,是万小足的小学同学李手开办的,李手的父亲曾经给万小足和李手,以及接下来要出场的陈鼻当过语文老师,把对文学的爱好传给了李手。这家中西合璧或者不中不西的餐馆,还真是按照塞万提斯的描述设置的,墙上挂着锈迹斑斑的盔甲与长矛、栩栩如生的鹿头标本、堂吉诃德和情敌决斗时戴的破手套,餐馆矮矮胖胖的服务员在万小足看来就像桑丘,也自称是桑丘,这里还有一位专职表演堂吉诃德的陈鼻,万小足的儿时玩伴。陈鼻自称是“来自西班牙的堂吉诃德”,手执一柄长剑,如同拄着一支拐杖,向“我”索要一支香烟。“尊敬的先生,高贵的夫人,对一个忠诚的骑士来说,没有比用手中的剑来保卫和平、伸张正义更神圣的事业了……”^[12]当年人高马大力量无穷的陈鼻,深眼窝大鼻子,有些混血儿的模样,因为鼻子异于他人而得名,此时已经是手指残缺的残疾人,在同学李手的餐馆里混日子,低声下气地向来客索要香烟,但更为凄惨的命运还在明天等着他。此后他因为遭遇车祸而撞伤双腿,

沦落到在来客甚多的送子娘娘庙前以行乞为生。接下来,他的在深圳工厂一场大火中被毁容的年轻女儿陈眉,为了替父亲赚取治疗双腿的费用,不得不充当代孕工具,而万小足正在陷入第二任妻子小狮子和他人设置的圈套,通过代孕的方式让陈眉为他生一个孩子。曾经在长安大道上纵马挥剑的骑士,终于走向穷途末路,为一个宏大时代的谢幕留下一个沉甸甸的惊叹号。

参考文献

- [1] 米勒. 解读叙事[M]. 申丹,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5.
- [2]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修订版. 田禾,译. 黄平,校.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4.
- [3] 陈梦溪. 舒乙先生患病多年,昏睡中曾用手指在夫人手上写字[N]. 北京晚报,2021-04-22.
- [4]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M]//赵树理. 赵树理选集. 北京:应急管理出版社,2023.
- [5] 莫言. 食草家族[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63.
- [6] 朱萌. 空间生产视角下城市社区网格的构建与重塑:基于 T 市 B 社区的案例研究[EB/OL]. (2022-05-29) [2024-02-10]. <http://sociologyol.ruc.edu.cn/shxyj/fzshx/csshx/e502bbf949554067b8a3c5a5015f1042.htm>.
- [7] 罗四鹤访谈于水山:长安街:建筑、符号与“现代化”[N]. 经济观察报,2016-12-15.
- [8] 郭小川. 望星空[M]//牛汉,谢冕. 新诗三百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 [9] 吴楚材,吴调侯. 古文观止[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0:228.
- [10] 陈众议. 塞万提斯研究文集[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336.
- [11] 钱理群. 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306-307.
- [12] 莫言. 蛙[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40.

Classical Rural Knights Encountering Modern Urban Wonders: A Case Study of *The Beauty Riding a Donkey on Chang'an Avenue*

ZHANG Zhizhong

(Qingdao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237, China)

Abstract: *The Beauty Riding a Donkey on Chang'an Avenue* is a short story in the form of “April Fool’s Day News” written by Mo Yan, which depicts the classical rural knights encountering the wonders of modern urban life. This paper discloses the discontinuiti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life, on the basis of Giddens’ modernity theory, Lefebvre’s spatial theory, and Qian Liqun’s interpretation of Don Quixote’s spirit. It reveals the contrasts between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and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the local literary trend of “country folks entering the cit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Don Quixote’s spirit in the world. It also highlights the rural people’s unique heroic qualities such as chivalry, rebellious spirit, and defiance of dogmatism.

Key words: Mo Yan; *The Beauty Riding a Donkey on Chang'an Avenue*; rural knights; urban wonders; Don Quixote’s spirit; chivalrous and rebellious spirit

〔责任编辑:王建霞〕